

文明与世界译丛

刘新成 刘文明
主编

多元现代性的反思

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

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EUROPEAN, CHINESE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

〔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 任斯·理德尔

〔以〕S.N.艾森斯塔德 编著

郭少棠 王为理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明与世界译丛

刘新成 刘文明 主编

多元现代性的反思

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

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EUROPEAN, CHINESE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

〔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 任斯·理德尔

〔以〕S.N.艾森斯塔德 编著

郭少槩 王为理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德)任斯·理德尔,(以)S. N. 艾森斯塔德编著;郭少棠,王为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文明与世界译丛)

ISBN 978-7-100-13995-3

I. ①多… II. ①多… ②任… ③S… ④郭… ⑤王…
III. ①现代化研究 IV. ①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3893 号

所有权利,侵权必究。

文明与世界译丛

多元现代性的反思

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

〔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

〔德〕任斯·理德尔

编著

〔以〕S. N. 艾森斯塔德

郭少棠 王为理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995-3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½

定价:54.00 元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by Dominic Sachsenmaier, Jens Riedel, Schmuël N. Eisenstadt © 2002
by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incorporates the imprints Brill | Nijhoff, Hotei and Global Oriental.

The Chinese version of "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is published with the arrangement of Brill.

英文原版：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
地址：荷兰莱顿，网址：<http://www.brillchina.cn>。

根据博睿学术出版社 2002 年版译出。

本书中文译本版权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

本译文限授权在中国内地使用。

总 序

刘新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 civilization(文明)一词出现之初就是一个解释世界的概念, 本套译丛以“文明与世界”为题, 原因可能也在这里。

“文明”曾把世界切割为“昨日世界”与“今日世界”。据考证, 最早使用 *civilisation*(相当于英文 *civilization*) 这个词的是法国人米拉波(1715—1789), 他曾指出, “文明”所指, 并非某特定阶层的专有行为, 而是一种本质性道德。同一时代的法国财务大臣杜尔哥(1729—1781)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1723—1816)则把“文明”视为过程, 即人的精神与行为逐渐发生变化。这些定义表明了“文明”的普适性和历史性, 亦即解释世界的工具属性。19世纪, 在进化论冲击之下, 西方的基佐(1787—1874)和东方的福泽谕吉(1835—1901)先后发表专论, 系统阐述文明的性质, 即个人的精神发育和社会的秩序养成, 二者都意味着进步, 于是为文明理论建立了一种“线性—进步”思维模式, 在这种模式之下, 论者习惯于将世界各地不同人类群体按其精神与秩序的不同发展程度置于“文明阶梯”——法国思想家戈比诺(1816—1882)所说——的不同层级之上。高低不同, 良莠有别, 先进者属于“今天”, 落后者则停留在“昨日”。当今人们用农业文

明、工业文明以及计算机文明或信息文明等为世界历史分期的时候,其实仍在沿用“线性—进步”文明观,只是采用了生产力标准。

文明也曾把世界切割为“自我世界”与“他人世界”。这种“切割”方式源于对“文明”的不同认识,即认为文明没有统一标准,可呈现出各种不同形态,而且各有其价值。这是一种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分类的文明观,其起源可追溯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将文明气质归因于地理环境;伏尔泰(1694—1778)高度尊重地方风俗——而总其成者则是19世纪的文化学者和社会学家。

19世纪欧洲社会危机频发,人们逐渐从“线性—进步”的幻境中清醒过来,他们不再盲目乐观,转而相信社会发展的“任意性”,相信前路多歧,选择才是最重要的,与其设想远景,莫若把握现实。于是社会进程研究让位于社会状态研究。在这一背景下,吕凯尔特(1823—1875)和涂尔干(1858—1917)等人提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需要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文明呈多种类型并共同存在,每种类型都是独立的有机体,都有独特意义。他们认为,统一的“文明”只是一种空洞的想象,脱离现实,不值得深入探究,社会科学家应该关注现实文明,即同一民族在同一社会化过程中遵循同样的标准,并且形成同样的价值观,因之在共同生活中总能协调一致。简言之,现实的文明就是民族性。他们认为民族本性永恒不变,因此各个文明必是凝固的,彼此隔绝的,每个文明都是独立的“自我”,“自我”之外均为“他人”。civilization一词在19世纪出现复数形式,这标志着多元文明观的形成。这种文明观仍把世界“切割”开来,只是不按发展序列而是

按文明类型“切割”。

欧洲论者无论切割世界的方式如何不同,都认为世界最终必将走向统一,而统一的形式必是欧洲文明一统天下,20 世纪备受争议的“欧洲中心论”由此而来。自我中心意识在欧洲由来已久。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人就自视高人一等,对“非我族类”一概以“蛮族”、“蒙昧、未开化之人”相称;从但丁(1265—1321)到格劳秀斯(1583—1645)、斯宾诺莎(1632—1677),历代先哲无不把“人文公民”(humana civilitas)、“理想人格”等美誉赋予现实或未来的欧洲人,而为其他民族贴上“缺少教养”、“未脱自然状态”等标签。这样便形成近代欧洲人以“文明人”自居,鄙视“土人”,甚至如弗格森者流将中国和印度置于文明社会之外的心理基础。但“欧洲中心论”盛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近代以来欧洲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使他们认为有资格自居于“文明阶梯”的顶端,有资格以“优势文明”自诩,以致戈比诺得出了优秀文明只属于纯种白人的荒谬结论。这种把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对立起来的二分法是助长欧洲殖民扩张、海外掠夺、征服世界的重要文化基础。

20 世纪风云激荡,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称霸一时的西欧诸国风光不再,而美国崛起谋求世界霸权;亚洲的觉醒改变了东西方力量对比,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取得国家主权,伸张发展权利;世界范围内经济交流日趋密切,全球化模式初步形成。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和民族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投射到理论领域,使文明研究这一高度学术性的话题在世界许多地方成为显学,以至联合国将 2001 年确定为“文明对话年”。

“文明研究热”在很大程度上仍围绕“欧洲中心论”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踏上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的浪潮中，社会发展呈趋同之势，地域性、民族性特点被不同程度地忽略和掩盖，“现代文明”似乎成为标准化的文明存在形式，大有统摄各类文明的趋势。在许多欧美人看来，现代文明是由世俗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基本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均来自欧洲传统，历史的发展印证了“线性—进步”发展观，人类社会终于按照欧洲人规制并践行的文明路线走到了终点。福山（1952—）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而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认为终结的原因，是由于西方人将他们发明的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撒手锏”教会了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并被后者所应用。当下，这种欧洲/西方中心论的极端表现是“美国文化中心主义”。这种理论否认文化差异的创新意义，倡导世界文化同质化、统一化，而统一的范本就是当代美国文化。

显然，渗透殖民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势必引起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的极大反感。非但如此，即使在西方学界内部，“欧洲中心论”也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批判的学理基础是从多元文明观推衍而来的文化相对主义。斯宾格勒（1880—1936）批评欧洲中心论是“历史的托勒密体系”，他说文化的本质是生活特征，不同的文化对应不同的社会实体，彼此之间不可通约，欧洲文明不存在同化异质文明的可能性，他呼吁欧洲放弃自我中心主义，建立“历史的哥白尼体系”。汤因比（1889—1975）则指出，所有文明在哲学意义上都是等价的，因为同原始社会相比，他们都取得了伟大成绩，而用人类理想来衡量，这些成绩都微不足道。

然而，无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如何否认“欧洲中心论”，他们都认为哥伦布以后的时代是欧洲文明的时代，与其他文明相比，欧洲近代文明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他们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不可能贯彻到底。

更有力的批判来自文明互动理论。与文化相对主义相反，文明互动理论认为文化是可以相互融通的，不同的文明正是在交流互动中取得发展。此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的进程》一书作者、社会学家埃利亚斯（1897—1990）。他说，从笛卡尔开始，西方学术就建立了一种自我中心的传统，把“思想着的自我”与“外部世界”两分，“自我”总是处在与他人和外界的对立之中，以致得出人类生活经验断无交流可能的错误结论。他说，每个“自我”都不能唯我独尊，社会的特点是相互依存，文明的习惯和秩序乃是相互学习的结果。20世纪中叶人类学提出“文化传播理论”，进一步解释了人类互相学习的机制。世界历史学科则总结人类生存经验，提出了文明互动学说。这些服膺“全球史观”的史学家，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从高度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类整体发展历程，得出的结论是：即使人类历史存在不同文明，世界的发展也从来不是始于某个特殊文明的推动，历史前进脚步总是与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相伴。“全球史学家”（global historians）认为，首先，从来不存在绝对孤立的文明，所有文明都是在与其他文明的共处中存在；其次，各个文明在共处过程中，或是因为发现他人的长处，或是因为迫于他者的压力，因而产生了学习的动机和发展的动力，所以历史车轮的推动者乃是文明互动。全球史学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推翻了许多传统结论。他们指出，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所

谓希腊文明，并不是纯粹“西方”的产物，而是吸收了许多来自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东方”元素；近代早期“西方的兴起”也并非源于西方文明的什么“特殊素质”，而是美洲、亚洲诸多地区亦曾参与其中的商业网络互动的结果。“全球史”研究的方法和结论或可商榷，但它不仅彻底颠覆了欧洲中心论的根基，而且一反“切割世界”的传统，提出了全球文明互动、整体运行的理念，对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的过去与未来或许产生积极的影响。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巴里·布赞（1940— ）在全球史观代表人物麦克尼尔的影响之下，力主国际关系学从“威斯特伐利亚束缚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中解脱出来，突破民族国家框架，从影响人类历史的诸多体系（如欧亚大陆体系、印度洋体系）和主要机制（即文明互动）出发重新思考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重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他说，从文明互动的角度看，所谓国际体系乃是各民族国家内部社会体系的总和，国际关系研究亦属文明互动研究，因此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文明，远非传统的政治学所能涵括。

人类在地球上已经有 5000 年的文明史，在悠久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共生、共存、共荣的生活经验。然而迄今为止的文明理论和文明史，大多专注于文明的区别和分裂，互相争斗和倾轧，而忘记了人是群居的动物，人类社会本质是相互依存，忘记了各种组织形式的人类群体都在互动中不断成长和发展，忘记了物种的传播怎样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繁衍，而细菌、病毒的危害和环境的破坏带给人类共同的灾难，同时也忘记了在人类各个群体中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对暴力、欺诈、偷窃和背叛的谴责同见于“摩

西十诫”、《薄伽梵歌》、《论语》和其他宗教或民族传统经典之中。这些“忘记”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和悲哀。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如《文化帝国主义》的作者汤林森所说，全球化将削弱所有国家的文化向心力，经济实力再强大也不能幸免。面对这一“文化危机”，究竟应该像当代极端文化相对主义者那样，死守自身价值，强调自我中心，坚决拒斥人类利益与价值的通约性，将世界一步步导入“文明的冲突”，还是应努力构建入江昭先生所设想的超越国家主权、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康德式“文明共同体”？这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明天的世界。

在《风险社会及其超越》一书中，作者贝克指出，在当今交往日益紧密的“地球村”，人为制造的风险越来越大，其中包括理论造成的风险。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因其概念、理论、话语不断循环往复于研究对象而“自反性”地重构和改变研究对象。为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能够规避风险，理论研究者有必要不断反思既往的文明学说，藉以塑造未来的和谐世界。我相信，这是本套译丛编者所期望的。

中译本前言

郭少棠

当部分国家已踏入后现代历史阶段的时候，现代化或现代性的课题的探讨已有了新的转向。这个转向是当前第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当 21 世纪拉开序幕不久，“9·11”世贸大爆炸和伊拉克战争迫使人类做出反思：经济和军事强国的外交霸权主义能否带来世界和平？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带动的“西化”和“现代化”浪潮，直接或间接把人类引入 20 世纪两次世界性战争的苦海，“9·11”世贸大爆炸和伊拉克战争的悲剧或多或少是建构 20 世纪新国际秩序过程中的阵痛。欧美国家所启动的现代化“鸿图大略”或由之而催生的现代性价值究竟应如何定位呢？这是当前第二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这都是新纪元人类必须具体反思的两大课题。

在全球化巨轮的滚动下，文化的移动和互动已愈来愈迅速和紧密。文化移动和互动的结果是文化的交汇或冲突。文化的本土化和全球化加深了文化移动和互动的复杂性，使原来已经纵横交错的文化演变历程更难以捉摸。18、19 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和进步主义观念影响下的文化图像必须再次被审视。《美国艺

术和科学院学报》《代达罗斯》(*Daedalus*) 在 2000 年先后刊登两期专辑, 分别探讨“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ies) 和“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自此以后, 这个由 S.N. 艾森斯塔德(Shmuel Eisenstadt) 所倡议的概念, 以复数取代单数来描述现代性在社会科学中迅速而广泛地被应用, 不同的研究计划和书刊都涉及该范式。路易斯·郎力加(Luis Roniger) 和卡路斯·卫斯曼(Carlos Waisman) 直接从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角度研究全球化和多元现代性, 显示两个大陆之间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现代化发展。年轻的德裔中国史学者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 邀请具全球影响力的波士顿顾问集团策略研究机构(The Strategy Institute of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并征得德国著名研究机构柏林科学研究中心协办, 于 2001 年 5 月在柏林组成一个以多元现代性为题的国际社会科学研讨会。研讨会的论文由萨赫森迈尔、任斯·理德尔(Jens Riedel) 和艾森斯塔德编辑成集, 文集选名为《多元现代性的反思: 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European, Chinese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2002 年 12 月, 萨赫森迈尔与柏林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德国史家于根·科佳(Jürgen Kocka) 在该中心组织另一个多元现代性跟进研讨会, 主题为“从意识形态与史学的关系探讨多元现代性”, 笔者应邀参加。会议结束后, 笔者建议把《多元现代性的反思》译成中文, 向华文世界读者介绍这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话语。透过萨赫森迈尔的转介, 取得出版社的支持, 波士顿顾问集团的赞助, 委托本人审阅及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为理负责翻译, 促成这本重要的论文集中译本面世。

现代化研究的兴起与演进实际是世界现代史发展典范的探索。笔者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追随政治学者 Reinhard Bendix, 历史学者 Wolfgang Sauer、Martin Jay、杜维明和 Franz Schurmann 研究比较现代化和比较中西思想史。当时正值现代化理论风气旺盛之际, John Brode 著的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n the 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Development* (1970) 整理了 20 世纪 50 年代西化 (Westernization) 和现代化理论的英语世界较重要的条目, 其中最受注目的要数 Alexander Gershenkron, “The Early Phase of Modernization”; W. W. Re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in Russia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艾森斯塔德的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1966) 和较早面世的 D.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ies* (1958) 及 Cyril Black, *The Dynamic of Modernization* (1966)。侧重从经济或工业化角度分析西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又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入手研究比较现代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较具代表性的有 Bendix,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1977); Barrington Moore Jr,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1971)。欧美英语世界研究现代化大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达至高潮。这股潮流主要修正了四五十年代以来西方中心的西化理论, 而尝试从比较发展的宏观架构下来排列不同国家和社会在现代化历程中的位置和特色。

欧美这股现代化研究潮流在 20 世纪 70 年代传至中国台湾史学及社会学界。金耀基的《从传统到现代》和《这个现代化与知识分子》; 其他学人的综合性论述亦在这个时期出现, 包括苏云峰 (1981)、张玉法 (1982)、李国祈 (1982)、张朋园 (1983)、王柏

槐(1984)。与此同时,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正式走上经济改革的道路,文化学术思潮同时做出回应,一股文化热潮逐渐澎湃,因而出现在未来学、科学系统学说及其他较接近西方的思想。大批西方发展理论,包括上文所述的论著,都先后被翻译成中文。1989年后罗荣渠仍领导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史进程研究中心全力推动中国和比较世界现代化的研究,他在1990年至1993年先后出版了几本甚具影响力的有关著作,包括他个人所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势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1990)、《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西方参考文献目录选编》(1990)和《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再探讨》译文集(1993)。

中国大陆研究现代化的理论和历史经验热潮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开始逐渐降温,部分原因是其中一位研究学者罗荣渠因急病离世,他在北京大学的研究中心仍然运作,但气势已不如以前。台湾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已逐步放弃对现代化问题的探讨。

笔者在1992年出版首本以中文撰写、研究德意志政治文化现代化的专著,1995年出版研究西方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成长的史学史专著。自从这两本专著面世后,笔者研究比较现代化的路向亦随着当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思想冲突而做出较重要的改变,这种改变实际也是对比较现代化研究理论的一种本质上的修订。

笔者选择的理论朝着两个新的方向发展。第一是从比较现代化转向跨文化和文化移动、迁移的架构。在文化的移动和跨越的

理念下，社会文化的特征相对时空的转变随之而变动。文化的跨越蕴涵着文化的多元性(plurality)和混杂性(hybridity)。第二，近代社会文化的本土性质和全球化发展之间出现不同形式的接触与互动，不同社会的文化既不能完全孤立于其他外来文化的迁徙或移动，但亦不会完全产生文化的全盘更换和变革。地域主义和本土特色始终为文化的塑造提供重要的土壤。比较研究假设着孤立而单纯的文化主体。文化的演变是混杂而多元的。由此类推，本土社会经历的现代化历程是没法完全雷同的。它们蕴涵或展示出来的现代性也自然是无限的多元性。就算在同一个民族或国家之内，不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可能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个地域广阔而文化复杂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实际很难超越这些地区的差异性，更不易忘记这些地域在不同形式的发展的时空环境下产生歧异的回应。

由萨赫森迈尔等主编的《多元现代性的反思》论文集，所有论文采取较宏观的角度反思中西方现代化和多元现代性理论，虽然无法深入和有力地展示多元现代性理念最核心的构成性质：文化的混杂和流动性，但起码已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接受的片面而僵硬的现代化理论做出彻底的修正。这本重要的论文集得以译成中文面世，肯定对华文学界有志于现代化或者现代性的研究人员有重大的启示和冲击。

目 录

鸣谢	1
前言	3

波尔科·冯·俄廷格

第一部 导言

多元现代性范式的背景	9
------------------	---

S.N. 艾森斯塔德 任斯·理德尔 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

第二部 多元现代性讨论的参数

对多元现代性的几点看法	41
-------------------	----

S.N. 艾森斯塔德

多元现代性——概念及其潜力	60
---------------------	----

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

全球化：现代性最新的形式？	93
---------------------	----

布鲁斯·马兹利什

第三部 西方现代性与普遍主义的论战

全球化世界中的文明与国家	107
--------------------	-----

普拉森吉特·丢拉